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改革开放史 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GAIGEKAIFANGSHI YANJIU ZHONG DE RUOGAN ZHONGDA WENTI

曹普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改革开放史 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GAIGEKAIFANGSHI YANJIU ZHONG DE RUOGAN ZHONGDA WENTI

曹普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曹普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211-06976-7

I. ①改… II. ①曹… III. ①改革开放—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6281 号

改革开放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GAIGE KAIFANGSHI YANJIU ZHONG DE RUOGAN ZHONGDA WENTI

作 者: 曹 普

责任编辑: 林俊杰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微 博: <http://weibo.com/fjpph>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976-7

定 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001

(一)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001

1.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001
2.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006
3.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农村百姓的生存状况/008

(二) 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巨大使中国面临沉重压力/011

1. 二战之后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011
2. 美、欧、日经济实力的大发展大跃升/012
3. 走出国门照“镜子”的巨大震撼/015
4. 邓小平亲自出访所感：“我们现在很需要跑！”/024

(三) “旧的那一套”几十年证明不成功，“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026

1. 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发出的一连串问号/026
2. “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028
3. 二十年艰辛探索为改革开放提供宝贵经验和重要准备/031

二、改革开放从“激活思想”破题：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035

(一) “两个凡是”方针使中国“困坐愁城”/035

1. “两个凡是”的实质与邓小平的鲜明态度/035
2. 无形的“精神枷锁”枷住了中国大踏步前进的手脚/038

(二) 澄清重大是非亟须确立“实践标准”/040

1. 不挣脱“两个凡是”束缚，“新道路”就无从开创/040
2. 邓小平正式复出后对“两个凡是”的进一步批评/041
3. 中央党校争论“路线”是非：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曲/043

(三) 最初的突破：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048

(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及反响/053

-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发表/053
- 2.邓小平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介入和支持/058

(五)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改革开放奠定思想基础/062

三、改革开放之高层决策：1978年的重要会议/069

(一)“勇敢地改革”，大胆地“引进”：国务院务虚会/070

- 1.会议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070
- 2.“先务虚，结合务实”：华国锋确定的四个议题/077
- 3.“敞开思想，充分议论”：“怎么把速度搞快些？”/080
- 4.“改革开放”是务虚会所议和李先念总结发言的主基调/085

(二)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全国计划会议/090

(三)决策改革开放的全面准备：中央工作会议/096

- 1.会议的由来和“中心问题”的确定/096
- 2.围绕“中心”深入讨论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办法和手段/102
- 3.围绕“中心”在其他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110
- 4.“改革开放”是会议所议和邓小平闭幕会上讲话的主基调/114

(四)正式决策改革开放的5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19

四、对外开放从“点”突破：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125

(一)“经济特区”方案之雏形：不谋而合求“特殊”/125

- 1.广东谋建宝安、珠海出口基地——“实行特殊管理办法”/125
- 2.香港招商局筹设蛇口工业区——经济上实行“特殊待遇”/131

(二)广东“希望中央给点权”与中央同意试办出口特区/134

- 1.广东酝酿“先走一步”/134
- 2.共同的体认：办“特区”系“为全国体制改革摸索经验”/139
- 3.授权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43

(三)“经济特区”如何“特”：自“翻筋斗”与借鉴国外经验/146

- 1.“出口特区”易名“经济特区”与制定“特区条例”/146

2. 特区之“特”的探索与对国外经济特区经验的借鉴/150	
(四) 经济特区在“秋风萧瑟”的争议中摸索前行/156	
1. “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需有“勇于创新的干部”/156	
2. 在姓“资”姓“社”质疑中进一步明确特区之“特”/159	
3. “经济特区”=“旧中国的租界”?/162	
(五) “看来路子走对了”:邓小平视察特区掀开对外开放 新一页/167	
五、改革开放的国情依据: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探讨/172	
(一) 历史回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认识和教训/173	
1. 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预测/173	
2. 列宁关于“发达”“完全”社会主义的论说/175	
3. 斯大林及其继承者:长期陷于“超越阶段”的泥潭/177	
4.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与实践中的 失误/181	
(二) 对国情的重新认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孕育/186	
1. “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186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两次使用与认识反复/189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第三次使用/192	
(三) 中共十三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195	
1. 中央领导层和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讨论/195	
2. 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全面阐述/200	
(四) 中共十三大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进一步发展/203	
六、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波折:价格改革“闯关”受挫与“治理 整顿”/207	
(一) 经济体制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207	
(二) 1988年“深化改革”的部署与价格改革“闯关”受挫/211	
1. “深化改革”: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第十个年头的主题词/211	
2. 价格改革的提出、舆论宣传与方案准备/216	
3. “抢购风潮”发生,价格改革“闯关”受挫/221	
(三) “治理整顿”方针的提出和初步实施/225	
1. “治理整顿”方针的提出和确立过程/225	

2. 以稳定物价和金融为中心的第一阶段“治理整顿”/229
- (四) 进一步“治理整顿”的决策与“治理整顿”的基本完成/232
- 七、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 14 年/239
 - (一) “计划经济”语境下关于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问题的辩争/239
 - (二) 改革的最初思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246
 1. 经济理论领域的拨乱反正与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反思/246
 2. 邓小平、陈云关于“价值法则”和“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论述/252
 3. 薛暮桥“商品经济”论：“对 30 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挑战”/254
 4. 陈云四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256
 5. 对“商品经济”论的批判与“主辅论”的确立/259
 - (三) 重大突破：“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确立/264
 1. “异端”写进中央文件：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商品经济”论及背景/264
 2. “巴山轮会议”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273
 3.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可以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76
 - (四) 新一轮争论与改革目标的最终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79
 1. 实行“市场经济”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279
 2. 邓小平三论“市场经济”与党中央在理论上作的深入“调研”/284
 3. 中共十四大“一锤定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88
 - (五) 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293

后记/298

一、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中国 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作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发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从我国自身情况看，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社会主义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党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号召力；从外部情况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范围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迅猛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党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带领人民赶上时代潮流。因此，30 多年前中国之所以要义无反顾地选择和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既是国内困境使然，也是外部压力使然，是国际国内“双重逼迫”的产物。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党和国家带来严重灾难

1956 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从 1957 年开始，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次遭受重大挫折。“左”的错误不断积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之久，严重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1.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

从政治上看，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家政治生活遭到巨大的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各项政治制度和规则或残缺虚置或极度变形，

党和政府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停止活动达九年之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十年没有召开。十年“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损害国家政权，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残酷迫害。“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38人，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382人。另据中央组织部统计，“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仅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列举的受诬陷、迫害的就有729511人之多，迫害致死的达34800多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①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一些地方私设公堂，私立监狱，私自关押干部群众，蛮横批斗、刑讯逼供、随意逮捕、任意抄家乃至草菅人命的现象在各地极为普遍，人民生命财产失去保障，整个社会生活陷入持续不断的动荡之中。

从经济上看，“文化大革命”推行极左政策，违背客观经济规律，严重阻碍了工农业生产，使我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不断后移，而且与许多国家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正确原则，如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等，一概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在生产关系上，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热衷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分配制度上，轻视物质利益，平均主义泛滥；在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编：《拨乱反正（中央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对外经济关系上，批判所谓“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对外引进工作承受巨大压力。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我国国民收入损失了5000亿元，这相当于新中国建立后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相当于全国40万个工交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的总和。从统计数字看，“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①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披露，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②。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最核心指标，代表着一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一切社会、政治、文化、国防等事业的物质基础，没有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和有效增长，其他方面的发展就无从谈起。从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看，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8%。据专家研究计算，1952年到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只有4.7%。整个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多数指标排在世界国家和地区170位以外，处于联合国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划定的贫困线之下。

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被发挥到了极致。我国计划经济很多方面学习苏联。苏联的计划经济，已有很多弊端；而中国的计划经济，则带有强烈的长官意志和主观随意性，一定意义上是“无计划的命令经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使中国企业失去了应有活力。1978年夏天，美国记者马修斯到广西桂林采访，他描述广西桂林丝厂的情况是：“同中国大多数工厂的情况一样，桂林丝厂的工人看来并不是干劲十足的。就业保障、退休金保证以及其他一些好处促使中学毕业生拼命挤进工厂去工作。因此，许多人都挤进了本

^①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228、282页。

^② 华国锋：《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1978年2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

来就已经过多的工人行列。当我走进一个车间的时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边桌上的另外三名女工聊天。我一进去，她们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着双手坐在那里。在我逗留的几分钟里，只有一个女工干了活，而没有一个女工说得清楚她们的生产定额是多少。”马修斯的评论是：“这种松松垮垮的工作态度，仍然是妨碍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重庆。一位日本记者在重庆钢铁厂采访时发现：这家年产30万吨原钢的工厂，使用的设备全都是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最令人惊异的是一台140多年前制造、清末张之洞从英国为汉阳兵工厂引进的蒸汽式轧钢机竟然还在使用。厂长对此的解释是：“因为质量好，所以一直在用。”^①其实，并不是质量好还在用，事实是从1965年开始，这家工厂就不断向上级打报告，要求进行技术改造，淘汰这台机器，但报告打了13年，上级还没有批准。对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妨碍和扼杀企业技术进步的现象，孙冶方称之为“复制古董”，认为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主要弊端之一。农村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同样严重压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8亿农民生活在5.4万个人民公社里，农民没有生产、分配、消费的自主权，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都由上级决定。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一些地方流传的“大呼隆”民谣，典型地反映了农民参加集体生产时消极怠工的情况：“一队打钟二队喊，三队四队往外撵，五队猛敲生铁板，六队地头把名点，喊破嗓子砸烂钟，社员迟迟不上工，树边候，路边等，蹭到地头坐个坑。”“集体活，慢慢磨，干得多了划不着。劳动多了你别喜，‘人八劳二’不由你，劳动少了不用愁，分配多少按人头。”“白天黑夜拼命干，不如生个大肉蛋（指生小孩）”。在上述体制下运转的中国社会和经济，求不倒退尚不可得，又如何谈得上发展呢？

从科技文化发展上看，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实行文化专制，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摧残尤为严重，使中

^①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百花凋零，学校停课，教育倒退，科学落后，文盲增多，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中等高等教育搞“革命”，中高等教育的考试被废除，一般的知识课程设置被打乱，中高等基础和专业基础知识被大量删减和简单化，正规的知识教育受到冲击，耽误了一代人知识的教育培养。很大一部分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的知识分子被打成“牛鬼蛇神”，许多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受到人身侮辱，被关进“牛棚”或下放“改造”，被称为“臭老九”，知识分子斯文扫地。十年间，高等教育和中专学校少培养几百万专业人才，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出现了长期空白，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2.3亿多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1/4。^①科技人员受到歧视，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许多学有所成、留洋回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文化大革命”期间，仅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在科技界制造的“两线一会”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的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有的被迫自杀。^②

新中国建立后一段时间，我国取得过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科技成就，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与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形势相比，中国除了某些军事工业技术外，其他各方面自主的科学技术与世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各发达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从20世纪初的10%提升到了50%~70%，而中国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从1952年至1957年的27.78%下降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8页。

② 《惊回眸，那个春天——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前前后后》，《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

至1965年至1976年间的4.12%。与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相比,“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的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对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①

由于“左”倾错误理论的影响,“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风社会风气被破坏,人们的道德水准下降,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迷信以及各种错误思想行为泛滥,内伤所及,无形损失更大。在“左”倾思潮指导下,许多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做法被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发展生产力被批作“唯生产力论”,重视物质利益原则被批作“物质刺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黑白不明,是非混淆,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四处泛滥,在一系列理论、政策上造成严重混乱。“文化大革命”号召“踢开党委闹革命”,全面破坏了党的组织建设,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遭到破坏,由此造成派别林立,以帮代党,以帮代政,严重地分裂了党政军组织和人民群众,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

2.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

实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堪虞。

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仅在1971年调整过一次工资,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长速度均为负增长,其中“三五”时期为-1.2%，“四五”时期为-0.1%。从1966年到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历年的平均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指数均低于“一五”期末的1957年和“二五”期末的1965年。^②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至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③1978年,失业的城镇青

① 《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学习时报》2008年9月1日。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969页。

③ 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897—898页。

年2000万人，实际城镇失业率高达19%左右，城市居民食品消费占其总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高达56.66%。很多日常生活消费品需要凭票购买。粮票流行了40年，与人民币同等重要，被称为“第二货币”。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是人人向往的“四大件”。直至1980年时，这“四大件”每百户的拥有率也只有5.5%、11.2%、15.7%、14.9%。黑白电视机的每百户拥有率也仅为1.6%；家庭电话非常少，即使把当时的公用电话列入计算，每百户普及率只有0.64部；而洗衣机还很少有，家庭轿车普及率几乎为零。

由于物资短缺，很多城乡居民家庭的耐用消费品同样需要凭票券购买。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有武汉市民回忆说：“在我们那个年代，几乎买一切东西都要凭票、凭证、凭券，买粮食要有粮票，买布要有布票，买其他用品要有公分券才行。我1968年参加工作，在武汉皮革厂做司炉工，工资比较高，吃饭是不成问题，但是好多生活用品还是买不到，因为物品供应太少，有钱也买不到。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叫‘三转一响一喀嚓’，三转就是当时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一响指收音机；一喀嚓就是皮鞋，在鞋底钉个铁脚掌，走起路来喀嚓作响。这几大样是人人羡慕的东西，也是当时有钱有能耐的标志。我年轻气盛，虚荣心也强，便想方设法地要搞到这些东西，再加上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没有这些东西是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你的。我当时置办的第一大件是缝纫机，省吃俭用整整攒了一年，攒了120个公分券，托熟人关系找到了供销社的主任，费尽种种周折才批来一台武汉天桥牌的缝纫机。当时还买不起有名的上海蝴蝶牌，但这也足足让我们全家高兴了好一阵子。第二年，我又花了189元钱托那个供销社主任买了一辆永久牌载重自行车，随后又买到了上海牌手表。三大件逐渐配齐，在那时风光了好一阵子。”^① 市民住房相当困难。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9.1%，而在“文化大革命”头五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仅占4%，后五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只占5.7%。人口的过快增长，加上住宅建设投资比重的下降，造成城市居

^① 《改革开放30周年报道读者来稿选登》，《长江商报》2008年5月8日。

民住房十分拥挤的状况。据 1978 年建设部对全国 182 个大中城市统计显示：全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是 3.6 平方米，182 个城市中共有缺房户 689 万户，占这些城市总户数的 35.8%。改革开放初期，上海 180 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 89.98 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 119499 户；父母与 12 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 316079 户；12 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 85603 户；两户同居一室的 44332 户；人均居住面积 2 平方米以下的 268650 户。^① 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1972 年 2 月，专栏作家赖斯顿随同尼克松到达阔别多年的上海访问，他的观感是：除了殖民地时代的华丽建筑，上海的市政建设在他的脑海里再没有留下任何其他印象。1974 年，法国社会学家朗兹也来到上海，还私自考察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在回国后撰写的描述上海见闻的札记中写道：“我看到在一条凝滞不动的小河边搭建起来的一间小屋。屋顶披着歪斜着的羊毛毡，上面压着几十个瓶瓶罐罐。窗户的玻璃全都破裂，显示着利齿般形状。至多只有 10 平方米的空间，却住着 5 口之家。时时可闻腐烂的蔬菜气息荡漾在小屋四周。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孟买、加尔各答和新墨西哥城……”^② 中国城市呈现的是一副破败的面貌。

3.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农村百姓的生存状况

农村的情况也很严重。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 年 6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放映了一部只有 10 分钟的内部参考片，片中反映的是安徽农村的贫困状况。这个片子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当时，中央政治局迅速作出决定，要尽快派一名得力的干部去主持安徽工作。”^③ 随后，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万里后来回忆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

①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上），《学习时报》2008 年 9 月 29 日。

② 何建华：《大地的警醒》，学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80 页。

③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新中国〉解说词》，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06 页。

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①安徽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

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

改革开放初期，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到中西部农村调查。结果，1979年全年农民的人均收入，最高的是山西吕梁地区，为70元；陇东庆阳第二，为64.86元；陕西的延安地区第三，为57.2元；榆林地区第四，为52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47.6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36.8元。而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农民年均收入只有达到100元才能解决温饱问题，满足最低生活需要。吕梁地区总共有13个县，山上9个县，147万人，山下4个县，103万人。1976年，吕梁地区粮食总产不到12亿斤，人均占有粮食只有400多斤，口粮仅200来斤，人均分配收入43元。最穷的临县，从1958年到1979年的22年中，每个农民平均每年从集体分得的收入，达到和超过40元的，仅有3年，其余19年都在40元以下，最低的1976年仅有21.8元，平均一天才6分钱。1976年，固原地区天灾人祸交加，全地区每人从集体分得口粮仅176斤；1977年，是中等年景，人均口粮223斤；1978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二个丰收年，人均口粮也只有329斤。有2/3至4/5以上的农民，常年挣扎在饥饿线上。^②

在地处西南的贵州省，1977年是1949年以来全省粮食总产最高的一年，也只比1957年增长21.4%，而同期人口却增加了57.1%，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比20年前下降22.8%，社员口粮水平下降约1/5，只有370斤左右；收入不足40元的生产队高达40%以上。许多生产队无粮无钱，有的连种子也要国家支援，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有困难。据统

^① 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②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个资深记者的亲身经历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9页。

计，该省镇宁县 1977 年全县社员分配收入人均 39 元；1978 年有 48% 的生产队人均口粮不足 300 斤，扣除口粮折款后，很多农户分不到现金，零花钱只能靠变卖粮食，实际吃粮水平更低。^①

在广东省，虽然临近港澳，发展条件优越，但由于政策上的问题，农村也相当贫穷落后。1978 年，深圳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是 134 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 13000 元港币，如此大的差距，使不少人铤而走险偷渡港澳。1979 年 1 月至 5 月，广东全省共有 11.9 万多人偷渡外逃，逃走 2.9 万多人，发生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 1962 年。仅 4 月 5 日一天，樟木头收容站收容人数就达到 3900 多人，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达 2500 多人。^②

有一组全国性的数据：1976 年全国农村人均口粮比 1957 年减少 4 斤；1977 年全国有 1.4 亿人平均口粮在 300 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1978 年全国受灾，农民生活更为艰难，年人均只能吃到原粮 248 斤，每天人均只有 6.7 两，而在贫困地区、重灾区连这个水平都达不到。1978 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67.71%；全国有 2.5 亿绝对贫困人口。另据农业部原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1978 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 50 元；有 1.12 亿人每天只能挣到 1 角 1 分钱，1.9 亿人每天能挣 1 角 3 分钱，有 2.7 亿人每天能挣 1 角 4 分钱。^③不少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就全国城乡居民粮油消费看，1976 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量为 380.56 斤，比 1966 年的 379.14 斤仅多 1.42 斤，比此前最高的 1956 年的 408.58 斤减少 28.02 斤；全国食用植物油人均消费量为 3.19 斤，低于 1966 年的 3.52 斤，比此前最高的 1956 年的 5.13 斤减少 1.94 斤。^④

①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个资深记者的亲身经历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8 页。

② 《反外逃情况汇报提纲》（1979 年 6 月 8 日），转引自《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8—79 页。

③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个资深记者的亲身经历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 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969 页。